

光緒三十年後，開考試東西洋遊學生之例，由考官會同學部，考取遊學之畢業生給以進士、舉人，再經廷試，高第者授翰林院編修檢討，數年間至百餘人，一時稱為洋翰林，謂其學由外洋而來考試，與未出國之翰林有異也。恰是時湖南王闓運年逾七十，以宿學保舉，於光緒三十四年授為翰林院檢討，正值遊學生之進士頗多，王曾有句云：「上無齒錄稱前輩，尚有牙科步後塵。」上句言科舉已停，已無齒錄之刻、翰林前輩之稱，下句謂遊學生考試有醫科進士，而醫科中有牙科也。此老滑稽，傳為笑談。

此事之所以可笑，正由於科舉出身的「士」和遊學歸來的知識份子截然不同，混在一起實在不倫不類。王闓運可以說是傳統士大夫的一種典型，但試以從英國遊學歸來的「工科進士」丁文江為例，他正是一位不折不扣的現代知識份子。他們兩人之間的差異是極其顯著的。1912年民國創建，翰林、進士、舉人都成為歷史名詞，士大夫的來源枯竭了，從此以後便只有知識份子了。

3 過渡階段的落日餘暉

但是政治制度的崩潰並沒有立即在社會結構方面引起重大的改變，更沒有觸動社會心理。因此在民國初期，中國社會仍然尊重知識份子如故，而知識份子也保存了濃厚的士大夫意識。大體上說，從十九世紀末年到「五四」時期是士大夫逐漸過渡到知識份子的階段，邊緣化的過程也由此開始。但是在這二、三十年中，我們卻看到知識份子在中國歷史舞台上演出一幕接著一幕的重頭戲。他們의思想和言論為中國求變求新提供了重要的依據。其中少數領袖人物更曾風靡一時，受到社會各階層人士的仰慕。所以在這個過渡階段，中國知識份子不但不在邊緣，而且還似乎居於最中心的地位。

但是這一短暫的現象並不足以說明知識份子的社會地位，它毋寧反映了士大夫的落日餘暉。當時一般社會人士是以從前對士大夫的心理來期待於新一代的知識領袖的。而剛剛從士大夫文化中轉過身來的知識份子也往往脫不掉「當今天下，捨我其誰」的氣概。梁漱溟先生在1918年寫過一篇文章，題目是「吾曹不出如蒼生何！」這是典型的士大夫心態，現代知識份子決不可能有這樣的想法。梁先生一生都體現了這一精神。事實上抱這樣態度的人決不止梁先生一人，他不過表現得更為突出而已。胡適在美國受過比較完整的現代教育，他在提倡白話文時也明白反對過「我們士大夫」和「他們老百姓」的二分法。但是他後來在討論中國的重建問題時，稍不經意便流露出土大夫的潛意識，所以他把日本的強盛歸功於伊藤博文、大久保利通、西鄉隆盛等幾十個人的努力。言外之意當然是寄望於中國少數知識領袖作同樣的努力（見《信心與反省》）。

4 士大夫觀念的死亡

必須說明，我並不是責備當時的知識份子，說他們不該有這樣的心理。從他們的文化背景來說，這種心理是很自然的，而且也是很難避免的，我只是指出一個歷史事實，即這些早期的知識份子並沒有自覺認識到：他們提倡各種思想文化的運動之所以獲得全國的熱烈反響，除了因民族危機而產生的種種客觀條件之外，在很大的程度上還托庇於士大夫文化的餘蔭。

「五四」運動便是一個例子。胡適在答梁漱溟的一封信中曾說：「當北洋軍人勢力正大的時候，北京學生奮臂一呼而武人倉皇失措，這便是文治勢力的明例。」（見《我們走那條